激荡的铁血旗

——辛亥武昌首义纪实

季宇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Ranshao De Tiexueqi

Xinhai Wuchang Shouyi Jishi

燃烧的铁血旗

季 宇 ★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 徽 教 育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燃烧的铁血旗：辛亥武昌首义纪实 / 季宇著.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12
ISBN 978-7-5336-5748-2

Ⅰ.①燃… Ⅱ.①季… Ⅲ.①武昌起义—史料 Ⅳ.①K257.4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61285 号

书名：**燃烧的铁血旗**
——辛亥武昌首义纪实　　作者：季　宇

出 版 人：朱智润　策划编辑：朱智润　杨多文　责任编辑：黄　文
技术编辑：王　琳　封面设计：吴亢宗　版式设计：朱　锦　封面题字：王亚洲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教育出版社　http://www.ahep.com.cn
（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邮编：230601）
营销部电话：（0551）3683010，3683011，3683015
排　　版：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合肥义兴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0551）3355286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24.5　字数：400 千字
版次：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36-5748-2　定价：36.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001 引 子

005 第一章 风雨欲来
005 雄楚楼密会
009 八月十五杀鞑子
011 偶发事件

014 第二章 天有不测风云
014 共进会的心脏
016 刘公兄弟
019 意外的变故
023 谁是犹大

028 第三章 危机四伏
028 小朝街八十五号
030 年轻的勇士
034 致命的延误

038 第四章 血腥之夜
038 死神的狞笑
045 血性男儿
049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053 第五章 生死关头
053 恐怖笼罩三镇
057 天塌下来长子顶
062 瑞激其人

066 第六章 大风起兮云飞扬
066 首义第一枪
074 楚望台重地
076 临时总指挥

082 第七章 飘扬的铁血战旗
082 张彪其人
084 南湖的炮声
090 风风火火闹武昌

095 第八章 权力真空
095 谁来领导我们
098 聚焦黎元洪
103 手刃革命党之说
108 赶鸭子上架

113 第九章 紫禁城的回声
113 帝国的心跳
117 奕劻其人
121 载沣其人

127 第十章 延误的战机
127 最初十六天
129 祭天大典
138 荫昌的尴尬

148 第十一章 奸雄本色
148 朝鲜往事
152 金蝉蜕壳
156 枪杆子与印把子
162 一八九八年的赌博
167 高处不胜寒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175 第十二章 武汉牌
175 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181 北洋军种种
186 看不见的指挥棒

191 第十三章 庐山真面目
191 十月二十七日的刘家庙
198 汉口溃败
201 黄兴的故事

213 第十四章 强者的对话
213 冯国璋其人
216 拜将的背后
222 汉阳攻略

229 第十五章 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229 声东击西
231 黄兴的情结
236 湘军的问题
246 一败再败
249 历史自有公论

254 第十六章 躁动的北方
254 后院失火
262 出师未捷身先死
272 谁是幕后黑手

278 第十七章 温柔一刀
278 武昌的命运
281 摇动的橄榄枝
288 天上不会掉馅饼

292 第十八章 不换脑袋就换人
292 停战的奥妙

297 冯国璋下课
303 段祺瑞其人

307 第十九章 政客秀
307 争权风波
310 汪精卫其人
317 游戏的两种玩法
321 廖顾密约

326 第二十章 谁主沉浮
326 拔树的方法
330 伟大的先驱者
335 全副革命精神

341 第二十一章 乱局中的博弈
341 捏不起来的拳头
348 中立的背后
355 孤独的战士

360 第二十二章 杀人不见血
360 内阁密奏
364 软弱的抵抗
368 六神无主

371 第二十三章 丧钟为谁而鸣
371 黑色的二十六日
373 良弼之死
380 走向共和

387 尾 声

引　子

公元一九〇一年，这是历史上又一个新世纪的开始，然而，对于大清帝国来说，新世纪却没有一点儿新气象。当时，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两宫“西巡”，一路逃往西安，行宫只好在陕甘总督衙门内临时将就，一切因陋就简，就连太后、皇上的御膳标准也大大降低了，每天约二百余两，由陕西巡抚岑春煊定准。慈禧太后不禁大为感慨，她对岑春煊说：

“向来在京时，膳费何止数倍于此，现在可是太节省了！”

岑春煊奏道：

“还可再省一点。”

以后每晚就由负责御膳的太监事先呈上菜单一百余种，供太后选择。与往日在宫中的奢靡相比，老佛爷真是受苦了！更让慈禧太后感到屈辱的是，有家不能回。所谓“西巡”不过是逃难的自欺欺人的美称而已。那段日子，她老人家吃不好，睡不安，常常以泪洗面，一夕数惊。然而，比老佛爷更苦的是另外一个人，此人便是进京与洋鬼子议和的李鸿章。

甲午之战后，李鸿章落魄广东，不问朝政。庚子变起，西太后又想到了这位当年的中兴名将，于是一日数电，促其出山收拾残局。此时的李鸿章已是七十九岁高龄，他强打精神赶到北京，尽管具有丰富的外交经验，工于心计，处事老辣，但在这种与外国侵略者的不平等的谈判中却处处显得力不从心。难堪的场面时常出现：

先是到京后，李鸿章煞费苦心，认真起草了一份议和章程。该章程字斟句酌，力争做到不卑不亢，可送到各国使节那里却被当成废纸一张。被推为各国领袖的意大利使节明确地告诉中方：“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们已是一败涂地，哪还有资格议和？只有遵照各国要求去办而已。”如此傲慢，李鸿章只能无言以对。

在谈判中，英国使节提出“偿还兵费”问题。

李鸿章说：

“兵费要多少?”

英使说:

“约在三十万万两左右。”

李说:

“中国急切之中恐怕筹不到这么多钱啊!”

英使说:

“若由各国掌管财赋,此款尚可筹措。”

李说:

“若是这样,中国就没有自主权了!”

英使说:

“事已至此,中国还希望有自主权吗?”

这简直就是强盗逻辑,但李鸿章能说什么呢?还是无言以对。①

李鸿章进京后曾约见了德军统帅瓦德西。瓦德西在联军攻陷北京后毫不顾忌地住进了紫禁城内的仪銮殿,那里可是太后的住处!瓦德西提出要在该殿接见李鸿章,李鸿章说什么也不肯,理由是“不敢僭入”。瓦德西只好让步改了场所。虽然在礼节上给了一个面子,可在谈判中瓦德西却咄咄逼人,一点情面也不讲。在谈到惩办罪魁问题时,瓦德西列出了载漪、载勋等王公大臣数十人名单,李鸿章极力辩解,为之开脱,瓦德西于是很不耐烦。他说:

“我所列的罪魁,其实都是从者,为保全中国体面,真正的罪首我们还没有提出。如果你连这个名单都不答应,那我们将要揪出真正的罪魁。”

真正的罪魁,这话明显是指太后的。李鸿章吓坏了,哪还敢再吱声!②

弱国无外交,战败国更无外交可言。当时的李鸿章左右为难:一边是朝廷压力,国人唾骂,一边是洋人蛮横,如狼似虎,李鸿章可谓内外交煎,心力交瘁,风烛残年的他终于一病不起,发烧吐血,死在谈判之中。临终前,他留下了一首感情复杂的诗:

劳劳车马未离鞍,
临事方知一死难。

---

① 佚名:《西巡回銮始末记》。

② 罗惇曧:《庚子国变记》。

三百年来伤国步，
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
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
诸君莫作等闲看。①

在这首诗中，饱经风霜的李鸿章对国家的未来和前途充满了忧虑和绝望。这些在新千年伊始出现的一个又一个不祥的征兆，似乎已经预示着满清统治气数将尽。如同病入膏肓之人，奄奄一息。此后，尽管这个衰老的帝国又苟延残喘，维持了十年，但到了公元一九一一年，它的末日终于还是来临了。

就在这一年的十月，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爆发了。

辛亥首义烈士公墓，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汉口利济北路。系阳夏战争中在汉口歆生路（今江汉路）至满春茶园一带阵亡民军官兵的丛葬地。

①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

辛亥革命发端于武昌起义。这场世纪风暴，仿佛一夜之间就发生了。但如果稍微注意一下历史，就会发现，这一切其实决非偶然。在这十年间，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情。帝国主义的侵略加剧了民族危机，大清王朝的腐朽更是激起了全国人民的痛恨。山河破碎，民不聊生，丧权辱国，专制黑暗，面对列强瓜分、亡国亡种的危险，社会各界、各阶层开始奋起反抗，开展了推翻满清帝国的斗争。一九〇四年七月，在孙中山先生的倡议下，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等反清团体联合起来，建立了一个统一的政党——中国同盟会，并确立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政治纲领。自此之后，革命运动江河浩荡，一日千里。在同盟会的领导和策动下，风起云涌的暴动和骚乱像野火一般四处弥漫。

地火在运行，怒潮在汹涌。宣统立朝以来，国内社会经济更是陷入全面混乱，革命运动如火如荼，遍地开花：徐锡麟刺杀巡抚恩铭，汪精卫谋炸摄政王载沣，温生才击毙广州将军孚琦；王和顺钦州起义，黄明堂镇南关起义，熊成基安庆起义，倪映典广州起义；此外，还有长沙抢米风潮等等，大大小小的抗捐抗税斗争此起彼伏。所谓动荡频发，乱象丛生，多事之秋，几无宁日。

公元一九一一年上半年，即武昌起义发生前，有两件大事值得一提：一是清政府宣布“铁路干线国有”，引发了大规模的“铁路风潮”；一是这一年的四月二十七日，同盟会领导人黄兴在广州发难，率一百多名敢死队员攻入两广总督衙门。这场战斗极其悲壮，事后殓收了烈士遗骸七十二具，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广州起义是同盟会在国内领导的第十次起义。这次起义前，孙中山先生曾在南洋庇能（今马来西亚槟榔屿）召集了一次由同盟会骨干和国内外代表参加的秘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曾有一个完整的计划，即广州首先发难，然后两湖（湖北、湖南）随之响应。但不幸的是，黄花岗起义没有成功，这样就使原先处于辅助地位的两湖开始变得重要起来。自一九一一年五月开始，同盟会把起义重点投向了长江流域。

武汉——这个湖北重镇——就这样走入了历史的中心。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　风雨欲来

雄楚楼密会

雄楚楼十号是位于武汉城北的一座不起眼的住宅，但在武昌起义发生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这里却发生了一个重要事件。湖北两大革命团体，共进会和文学会的代表在这里举行了密会，实现了两会的正式联合。

湖北起义的筹划，最早可追溯到光绪年间。据史料记载，科学补习所是湖北成立的最早的革命团体。该团体成立于光绪三十年（一九〇四年）五月，所长为吕大森，总干事为胡瑛，骨干有曹亚伯、张难先、宋教仁等。该团体与孙中山的兴中会、黄兴的华兴会都有密切联系。他们曾计划在当年秋天的农历十一月十日，西太后诞辰之日发动起义，但不幸的是，消息走漏，机关被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所查抄。

科学补习所维持的时间很短，只有几个月，但到了第二年的冬天，一个新的秘密团体又像春韭菜似的冒出头来。

这个团体就是日知会。

日知会是湖北近代史上一个影响较大的革命团体，它导源于科学补习所，会员大半以上也为原科补所成员，而后来轰动一时的共进会和文学社，又亦肇基于此。因此，有人说，日知会最大的功劳就是承上启下，使革命火种得以延续。

日知会正式成立于光绪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正月，会长是武昌高家巷圣公会牧师胡兰亭，副会长是刘静庵（实际主持）。该会成立后发展很快，不到两个月，已在军学界发展会员数千人。但是，日知会的发展引起了官方的注意。同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九日，武汉军警突然展开了一场针对日知会的大搜捕。日知会骨干先后被捕，史称“丙午大狱”，该会从此一蹶不振。

日知会失败后，湖北地区又先后出现了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等团体，但都转瞬即逝，没有形成气候。到了宣统年间，共进会和文学社先后成立，湖北革命才又进入一个新的高潮时期。

辛亥革命发生后，人们曾饶有兴趣地探讨过这样一个问题，即这场伟大的革命为什么偏偏发生在湖北，并取得最终的突破。原因当然有很多。除了政治、经济、社会、自然、地理等诸方面因素外，有学者认为，武昌首义与张之洞在湖北推行“新政”不无关系，近代军事和工业的发展导致新思想在社会各阶层，尤其是新军士兵中迅速传播，而湖北革命的优良传统和革命党人的宣传组织工作基础深厚，且卓有成效，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这个分析具有相当道理。在武昌首义前，革命党已不断发展壮大，积聚了颇为可观的力量，尤其是在新军中人数众多。湖北新军在编制上分第八镇和第二十一混成协，共计人数约一万五千人，而参加文学社和共进会的士兵就达五千人，占了全部人数的三分之一，加上同情革命者则人数更多。这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它是革命党人多年来不畏流血牺牲、不屈不挠、辛勤努力的结果。在当时各省革命团体中，力量最大者当称湖北。

然而，对于湖北革命党来说，在起义发动前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统一领导权。

湖北革命团体众多，其中共进会和文学社影响最大，也最为著名。共进会一九〇七年成立于日本东京，后转入湖北活动，领导人刘公、孙武、刘英等都是同盟会员，并留学海外。文学社成立于一九一一年三月，由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演变而来，领导人是蒋翊武、王宪章、刘复基等。两大团体的目标都是以推翻满清为己任。共进会的特点是，接受同盟会的领导，以同盟会的宗旨为宗旨，在军学各界发展成员。文学社的特点是，自成一统，专门在新军中发展成员（据说这与会长蒋翊武的指导思想有关，蒋认为军人讲义气，简单耿直，不易暴露，为谨慎起见，他不主张外人加入）。据有关史料记载，辛亥起义前，共进会发展会员二千余人，文学社发展会员五千余人。从人数上，文学社虽优于共进会，但从声望和影响上却不及共进会。因为文学社的成员仅局限于军人，而共进会的成员除了军人之外，还广泛吸纳了社会各阶层人士，包括知识分子，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共进会接受同盟会的领导，来头更为正宗。

文学社虽不隶属于同盟会，但却认同同盟会。按照蒋翊武的说法，军人的“名分”以武力推翻满清，至于革新政治，则有待于同盟会内外同志主持。从这一点看，文学社

与共进会目标一致，但由于门户之见，彼此各立山头，为了争夺会员、发展势力，冲突不断，关系紧张。这种情况显然不利于革命发展，两个团体中的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联合之事便被提了出来。

然而，此事开初并不顺利。共进会方面以老大自居，颇有合并文学社之意，而文学社则坚决反对。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一直对共进会抱有戒心。他认为，“共进会都是些穿西服的洋老爷和洋学生，他们计谋高，派头大，我们这些丘八，被他们所瞧不起，我们也缠不赢他们”。他主张殊途同归，各走各的路。①

蒋翊武的想法反映了文学社和共进会的差异。的确，文学社的领导人，无论是蒋翊武，还是刘复基、王宪章等都是投身行伍的贫苦知识分子，而共进会的领导人如刘公、孙武、刘英等都出身富裕之家，并曾留学国外。这种差异造成了彼此的隔阂，但好在刘复基等同志从大局出发，从中反复做工作，蒋翊武才同意与共进会进行接触。

蒋翊武

据李春萱回忆说，合并的谈判主要有三次。第一次谈判是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五月初，在武昌工程营后面的孙武宅。参加人员，文学社方面是蒋翊武、刘复基，共进会方面有孙武、邓玉麟等。在会谈中，大家对联合的必要性，均无异议，但对联合后的领导权问题，却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蒋翊武在会上说：“现在文学社在军营中发展的力量很大，我们合作后，少数应服从多数。”他强调，双方联合后要以文学社为主体。

孙武不以为然，他说：“我们共进会是同盟会的系统，直属东京本部领导，与各省都有联络，在本省同志很多。”他还说，从军中组织的历史沿革来看，共进会也在文学社之先，当然应居领导地位。共进会方面甚至提出，文学社经费困难，他们可以资助，并以此为条件，推选孙武为领袖。

文学社当然无法接受，双方互不相让，结果使谈判迷失了方向，陷入僵局。

第一次谈判不欢而散，问题主要出在蒋翊武和孙武二人身上。事后，文学社和共进会的一些同志都对他们这种不顾大局，比力量、争领导的做法，有所批评，并进行了劝说。

---

① 陈庆华：《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与清末革命运动》。

随后，双方又进行了两次正式会谈。一次是辛亥年（一九一一年）五月中旬，地点在龚霞初家中。这次会谈，蒋翊武与孙武均未参加。参加人员，文学社方面有刘复基、王守愚等；共进会方面有邓玉麟、杨玉如、李春萱等。这次会谈气氛融洽，双方都抱着坦诚的态度，原则上达成了联合意向，但领导权问题仍悬而未决。

最后，邓玉麟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即领导"可以共同担任"。

这个提法比较含混，可它毕竟绕过了一个困难而敏感的问题，使会谈在求同存异的前提下向前迈进了一步。

此后，局势迅速发展，起义迫在眉睫。辛亥年八月初二，即一九一一年九月二十三日（一说是九月十四日），两团体进入了最后的实质性会谈。这就是著名的雄楚楼会议，会议的地点就在雄楚楼十号。

雄楚楼十号是当时共进会领导人刘公的住宅，也是共进会秘密活动的据点之一。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员都是两会的重要人物。作为文学社主要领导人蒋翊武是否参加了这次会议，说法不一。杨玉如回忆说，蒋翊武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作了发言。但李春萱的回忆则不同，他说，蒋翊武此时已随其所在的第四十一标第三营调防岳州，不在武昌，文学社方面，是由刘复基作为全权代表。杨玉如和李春萱都是亲历武昌首义的革命同志，他们的回忆尽管在蒋翊武是否参加上有所出入，但不论蒋翊武是否参加，此次会议仍可视为两团体"高峰会谈"。共进会方面，刘公、孙武两位主要领导亲自到会。据杨玉如回忆说，中部同盟会的负责人居正也莅临了会议。①

会议由刘公担任主席。会议一开始，孙武作了武汉起义准备的发言。他说，武汉革命前后十数年，历经坎坷与磨难，现在时机成熟，到了最后向满清摊牌的时候了。湖北地处中华腹地，影响大，困难也多。两团体若不联合，则势难成功。

与会者一致赞同孙武的发言。刘复基首先表态，生死关头，不分彼此。他建议，文学社与共进会的名称可一律不用，大家以武昌革命党人的身份，与清廷拼个你死我活。

刘复基的积极态度使整个会谈的气氛热烈起来。居正是同盟会派来的代表，他提议为确保起义成功，可敦请中部同盟会，派黄兴、宋教仁等来汉帮助共同主持，具体名义可等他们抵达后再定。居正的提议实际上是同盟会整个计划的一部分。他们希望把湖北革命的领导权置于同盟会的领导之下，但这个计划实施得并不顺利。后来黄兴到汉后不久，便与孙武等人发生尖锐的冲突。这是后话。

---

①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

经过一番讨论及相互让步，双方最后在领导权问题上达成了协议：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总管军事；孙武为军政部长，负责军事行政；刘公为总理，专司民政；而军政大权则由蒋、孙二人分担。并特别规定，重大事项需由三人共召众人集体商定。这样的安排非常微妙：首先，文学社的人做了总指挥，可在领导人数上却形成共进会与文学社二比一的格局；其次，刘公是同盟会原来内定的湖北大都督，位居蒋、孙之上，为了平衡，被委以总理，专司民政。

这样的安排，从表面上看各有分工，而实际上职权却极不明确。这就为以后留下了隐患。武昌首义后，革命党人被架空，并相互残杀，如果追根求源，都与此不无关系。李春萱后来回忆说：

> 刘公是好好先生，对此未表示意见。这样划分，职权极不明确，究竟是谁指挥谁，也未加以规定。不过，当时只有这样划分，才能使三人的矛盾，暂时得到统一；事实上三人从此形成了各不相下的恶劣局面。所以武昌首义成功以后，三人明争暗斗，矛盾逐渐发展，才被立宪党人钻了空子，为黎元洪创造了机会，结果革命党人，同归于尽，都是这些各不相下的原因所引起的。①

应该说，李春萱的这段回忆一针见血，如今重新读来，仍令人感慨万千。这些辛亥志士，一边不畏牺牲，英勇抗争，一边又陷入派系争斗，互不相让。起义尚未开始，争权夺利已在暗中进行。这就削弱了革命的力量，给革命造成了很大损失，令人痛心。

不过，雄楚楼会议终于促成了联合的达成。

这是一个重大成果。

八月十五杀鞑子

雄楚楼会议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实现了两团体联合，而且正式建立了起义指挥部。

---

① 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

武昌起义的酝酿早在黄花岗起义发动前就已开始。当时，孙中山、黄兴拟在广州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他们派谭人凤前往武汉，一方面向共进会领导通报起义计划，另一方面希望共进会在两湖组织响应。虽然黄花岗起义最终失败了，但革命志士的流血却激发了湖北革命党人的斗志。他们决定由被动之势转为主动之势，在武汉发动起义。

此时，同盟会高层对于下一步战略的意见发生分歧，黄兴主张继续经营华南，宋教仁则坚持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与谭人凤、陈其美等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积极策动在长江流域地区的起义，并通过共进会在武汉方面积极活动。武汉的起义准备和两团体合并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的。

公元一九一一年九月七日——雄楚楼会议召开前夕——四川总督赵尔丰不顾全国社会各界反对，公然枪杀保路会请愿士绅，酿成了死三十二人、伤数百人的成都血案。血案发生后，朝野一片哗然。可谓人神共愤，声讨四起，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反抗浪潮。革命党人认为，起义的时机已经到来了。

在雄楚楼会议之后的第二天，起义指挥部便马不停蹄，趁热打铁，在武昌胭脂巷十一号举行了一次由两团体骨干参加的大会，会上正式做出了起义的决定。

武昌胭脂巷十一号是革命同志胡祖舜的住宅。据说，参加此次会议的约有六十余人（一说近百人）。会议从上午十时许持续到下午一时左右结束。会上，气氛热烈，群情激愤，大家一致决定于十月六日（阴历八月十五，中秋节）举行起义。这是一次关于起义的总动员，也是指挥部成立后第一次正式做出起义计划。至于时间为何定在中秋节，也许是个巧合，但它却暗合了历史上“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说。

据亲历首义的同志回忆，成都血案引发了四川保路同志会的一系列暴动，事态迅速向各地波及。京中王公大臣们慌了手脚，一边敷衍舆论，一边敦促督办铁路大臣端方迅即率部入川，平息骚乱。因为湖北紧邻四川，为了尽快平息川省之乱，朝廷急调湖北陆军第三十一标全标和第三十二标之一营，随端方入川。这一调动，自然引发了湖北方面的一系列军事调动。其中，蒋翊武所在的第四十一标第三营被调往岳州驻防，也发生在这前后。

湖北军方的调动给起义带来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困难。由于两团体的会员很多都是士兵，他们分散在各营中，一旦部队调动，原先的组织系统便被打乱，而一些同志随部队离开武昌，也削弱了起义力量。因此，在胭脂巷会议上，大家一方面感到了时机的成熟，另一方面也意识到不能再等待下去，必须立即发动起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